

嚴復的終極追尋： 自由主義與文化交融

• 黃克武

一 引言

嚴復(1854-1921)是一位將西方自由主義傳入近代中國的先驅人物。他一方面譯介、宣傳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誤會、批判西方的自由理念，因而形成了一個異於西方模型的中國式自由主義。對嚴復自由思想的分析，不僅可以了解中西文化交融的複雜性，也可以讓我們思索自由主義的現在處境與未來展望。

嚴復的自由思想是基於柏林(Isaiah Berlin)所謂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民主社會。在此社會之中，個人經由菁英所領導的教育，培養民德、民智、民力，成為現代「國民」之後，可以自由地追尋己身權益。與現代中國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嚴復的政治理論嘗試結合兩個理想：一是建立一個自由與富強的國家，二是堅持傳統的道德理想。這一個結合可以稱為是「自由」的，因為他的理念融合了主要源於中國儒道傳統的精神價值，與主要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同時，他提倡以漸進改革來實現上述的目標。

嚴復的政治理論嘗試結合兩個理想：一是建立一個自由與富強的國家，二是堅持傳統的道德理想。這一個結合可以稱為是「自由」的，因為他的理念融合了主要源於中國儒道傳統的精神價值，與主要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 嚴復論中西文化

自西力東漸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最感困惑，而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是：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係。嚴復畢生努力的目標，即嘗試解決此一問題。他了解在結合中西之前，要明瞭中西之異同。同時對此議題的正確理解，將可作為教育之基礎。這樣一來，配合他的菁英主義，以及當時盛行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林毓生語)之想法，嚴復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必須針對中西文化如何交融之議題，駁斥錯誤思想，建立正確典範。

(1) 中西文明之分合

嚴復了解到，因為歷史、文化的差異，西方產生了中國所沒有的「政界自由」。由於此一差異，中西文明之間幾乎存在着系統性的歧異。然而嚴復也看到

兩者的合流：例如儒家絜矩之道與自由觀念相通、楊朱哲學與西方個人主義是一致的、中西學界均看到公私可以兩立、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社會學與《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可相互發明等。

在上述分流與合流的交織之下，嚴復對中西的結合感到樂觀。早在1895年他說在通西學之後，再反觀吾聖人之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1902年他與吳汝綸 (1840-1903) 討論時表示：「新學愈進則舊學愈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他在討論教育時也說「必將闢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以上「統新故、苞中外」的想法在他的晚年變得更為重要，1917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對於中西文化，人們應觀其「會通」，以新式機器開發四書五經之礦藏。

會通中西的想法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特別是新儒家思想之中，變得非常重要。這樣一來，嚴復闡釋了一個至今仍具重要性的文化融合的典範。根據此一典範，創造性地結合部分中西理念，搗成一個新的文化是可能的。這不僅是因為一些有價值的中西觀念早已會通，而且因為中國能夠從採取她所缺乏的一些西方觀念之中獲得利益。此一規範性的典範與當時流行的一些理論有明顯的不同。

(2) 反對中體西用、全盤西化與西學源於中國說

嚴復反對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論，也反對「政本藝末」。由此可見，嚴復雖然也用體用、本末等語彙，卻不同意將這些概念應用到對東西文化的理解與文化交流。嚴復強調文化的整體性與有機性。

嚴復反對不顧東西文化的內在差異，而作無根的移植。這樣一來，嚴復關於文化修改問題的看法不容易偏到像五四時期的學者那樣的全盤西化論。他不但在晚年反傳統浪潮之中提倡尊孔、讀經，即使在嚴復早年積極提倡西方文化之時，他也不曾主張要完全放棄中國文化。

嚴復的想法似乎處於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之間，然而他所構想的文化修改的方式，和清末西學源於中國說也不相同。他反對一些人認為西方議院、憲法等中國古已有之。

(3) 整體主義與有機主義

上文曾指出嚴復強調文化的整體性與有機性，林毓生也強調全盤西化的反傳統主義是奠基於文化有機體理論。嚴復的想法與全盤西化論者所持的有機論類似，卻又不同。

林毓生在此處所指出的想法是將文化視為是一個整體，因此只能全盤接受或全盤拒絕。例如，我們無法選取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而捨棄其他的部分。但是這種整體主義只是當時針對以下兩個議題所提出的諸多理論之一種，這兩個議題是社會的本質為何、改變社會的方法又為何。

首先，當時存有林毓生所謂反傳統主義者的「有機整體」的想法。雖然我們不能忽略，反傳統主義者不但預設了文化有如一有機整體，而且悖論式地認

嚴復強調文化的整體性與有機性。他反對不顧東西文化的內在差異，而作無根的移植。這樣一來，嚴復關於文化修改問題的看法不容易偏到像五四時期的學者那樣的全盤西化論，他的想法似乎處於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之間。

為，這一個文化系統中的成員能批判此一整體，創造一個新的有機體。第二種看法，不將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而只視為是各種部分拼湊而成的，因此只能以零碎的方式來作調整。第三種觀點是像鄭觀應、張之洞那樣，將要改變的對象分為體與用，或道與器，認為前者應繼續堅持，而後者則是能夠被調整的。第四種觀點認為不同文化之間有取捨的可能，因此文化修改不是零碎的調整，也不是體用概念所允諾的，而是基於主體的批判意識，追求如何才能形成一個結合本土與外來觀念之有機整體。

嚴復對文化修改的看法顯然接近第四種，但是他還是堅持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同時，在斯賓塞的影響之下，他不斷地強調有機體的整體表現，要依賴組成此一有機體成員的品質，這樣的成員當然包括像嚴復那樣具有批判意識與思考能力的「自由」人。

這樣一來，斯賓塞的有機體理論讓嚴復可以將中國想像為一個國群，但是並不妨礙文化採借的可能性。換言之，嚴復認為人們可以針對文化遺產作一取捨，以形成一個新的有機整體，在這方面，他堅持中西文化的交融。此一觀點與林毓生所討論的一元論的反傳統思想有所不同。這兩個觀點均視國家社會如一有機體，但是嚴復並沒有將此整體變成一個只能完全接受，或完全拋棄的對象。當然，我們不應忽略，嚴復所構想的有機整體與他對社會中自由與利他可以並重、公私利益可以不相衝突的道德視野，是相互配合的。

(4) 結合中西之長的典範

對嚴復來說，創造性地搏成一新的有機整體，需要基於現有合流之趨向，並採取西方的長處。此一想法與當時流行的一種結合先秦與西方之典範有類似之處。這種說法以為中國傳統之中先秦的政治與文化遺產是具有正面價值的，後來因為秦朝的專制與焚書，造成斷裂。例如梁啟超在湖南時（約1897年）就提出應結合先秦與西方而創造一個新的文明。嚴復對此看法有所懷疑，他似乎比較傾向一元式、演化式的歷史觀，雖然肯定鑒往知來的價值，認為從固有文化中可以「披沙見金」，但是並不認為歷史上有一個黃金時代可以為後代取法。

嚴復所主張的是針對時勢、漸進調適，以教育改革的方式逐漸將西方文化的長處融入中國文化之中，在此過程中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可供依循。雖然如此，嚴復在中國文化之中所特別欣賞的還是四書、老莊等先秦作品，他又堅持使用「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文字，這樣一來嚴復的觀點與梁啟超所揭櫫的典範之間還有某種程度的親近性。其精神也與任公所謂「淬厲」、「採補」，「二者缺一，時乃無功」的想法，是一致的。

總之，嚴復（和梁啟超）的文化修改方式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均不相同。他們不但強調先秦學說的意義，而且主張中國有關內在世界（倫理與形上智慧）的知識，與西方有關外在世界（主要是科學與民主）的知識結合為一，同時外在世界還要維繫中國五倫的秩序，而內在世界也要肯定西方如「所以存我」、「開明自營」的精神。然而，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中西要如何結合？嚴復對教育問題的看法，透露了他的觀點。

嚴復對梁啟超提出應結合先秦與西方而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的看法有所懷疑，他似乎比較傾向一元式、演化式的歷史觀，雖然肯定鑒往知來的價值，但是並不認為歷史上有一個黃金時代可以為後代取法。嚴復主張以教育改革的方式逐漸將西方文化的長處融入中國文化之中。

三 嚴復論教育：菁英領導、德育優先

以教育來「癒患」是嚴復終生關懷的議題，這一構想不但源於他本身的經驗，也體現上述文化交融的典範。呼應他所揭櫫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政治理想，嚴復將教育分為體育、智育、德育三個部分。他認為三者之中以德育最為重要，其次是智育，再其次是體育。

嚴復指出體育與智育，隨時代進步而產生變化，尤其是智育方面，西人有重要的成就。但是德育方面，西人「進於古者」非常有限，所以德育要以固有的「經常之道」為基礎。更具體地說，嚴復認為德育的基礎是儒家的「五倫」。

嚴復對儒家倫理的基本條目，如絜矩之道、恕，與《大學》八綱目等的肯定顯然是不曾改變。不容諱言，嚴復德育思想的焦點在前後期有所不同，早年較重視「新民德」，亦即是強調公民資格的建立，1906年以後則較為提倡以傳統德目為中心的「德育」。

嚴復對傳統道德條目的肯定至晚年變得更為強烈，1921年他在死前曾將一生經歷總結，供後代子孫參考，包括肯定傳統、重視合群、追求知識、鍛鍊身體、安平度世等，和他一貫對德、智、體諸育的看法相配合。

嚴復對教育的態度直接影響到他對於教學的看法。他認為針對不同的學生與學科，有不同的教學方式。再者，智德二育的教學方法也有所不同。智育要讓學生明白其「所以然」，德育方面則要先使學生遵循紀律，等到年歲增長，再啟發其所以然。

嚴復對教育與教學的想法顯示：他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富強與自由的國家，必須以教育方式，培養出德智力兼備的現代國民，其內容以儒家倫理為根基，吸收西方思想、制度與科技成就。在此理念之下，他強調中西學應分而治之，並在個體之上完成融合。

1902年，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清楚地揭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在此文之中，他一方面表示：中國應採行的教育絕非「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因此舊有之「經籍典章」不應廢除；另一方面他則強調西學為當務之急，而「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

嚴復所設計的教育體制如下：在小學時，以中學為主，減少記誦，增加講解；中學堂的學生需錄取「中學有根柢者」，「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四五年之後升入高等學堂的預科，三四年之後再分治專門學科。同時他也主張公派留學。嚴復說：

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

1912年，嚴復任北大校長，他將此一中西學分而治之的理念付諸實施。他在寫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中表示：

1902年，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清楚地揭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他一方面表示：中國應採行的教育絕非「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因此舊有之「經籍典章」不應廢除；另一方面他則強調西學為當務之急，而「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

比者，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併為一，以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

嚴復屬意陳三立(1852?-1937)與姚永概(1866-1923)來主其事。後陳三立堅持不就；姚永概則出任北大文科教務長，1913年辭職。

此段史料被許多學者解視為嚴復轉向保守、不再主張融合中西文化。這樣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首先，我同意四川大學謝放教授的觀點：嚴復所謂「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為之不已，其終且至於兩亡」，其實與他在1902年所提出的中西學各有其體用、新舊學分而治之的想法是一貫的。可惜我們沒有1913年的資料，但根據1914年出版的《北京大學規程》，在此之前北大文科設有三個學門：中國哲學、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這顯示北大文科中的西學應是存在的。這也涉及當時北大經費窘困，只能選擇性地分治中西學，而絕非不講西學。

其次，此次將經文兩科合併，乃呼應蔡元培在同時所提倡的大學廢除經科的構想。將儒家經典的學習分攤到哲學、史學、文學等分科之中。其中具有很強烈的脫離傳統、開創新局的意義，不宜簡單地視為轉向保守。

第三，嚴復所說的舊學其實並非所有傳統的學問，主要是他所支持的桐城派的學問，主張文以載道與經世致用，而反對訓詁考據。陳三立、姚永概所代表的即為此一學風。姚去職後，由夏錫祺接替。夏引進了大批章炳麟的私塾弟子，如黃侃、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康寶忠、朱希祖等人，北大文科之學風轉向考據。這些人正是嚴復所批評的「今日號治舊學者，特訓詁文章之士已耳。故學雖成，期於社會人群無俾力也」。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嚴復在1912年寫給熊純如的信，仍清楚地顯示他在思想上、學術上的一貫性。以中西學分治，在個人身上結合為一的方法，來尋求中西文化的融合，仍是他所追求的目標。

嚴復甚至將此一方法用在家庭教育之中。1915年他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談到他的理念：「復教子弟，以現時學校之難信，故寧在家延師先治中學，至十四五而後，放手專治西文，一切新學皆用西書，不假譯本，而後相時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後卒業」。

嚴復對教育與教學的觀念，與他結合傳統道德與西方價值的政治理論完全配合。這也顯示出在嚴復心目中，個人在自由社會中自由成長的情狀。嚴復認為一個自由社會有如一個學校，由菁英份子設定教育目標與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德、智、力，使之不斷追尋以成就一更佳之個體。此一由菁英份子自上至下，培育人民之積極自由的方式，在現代中國自由傳統之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嚴復所說的舊學其實並非所有傳統的學問，主要是他所支持的桐城派的學問，主張文以載道與經世致用，而反對訓詁考據。陳三立、姚永概所代表的即為此一學風。以中西學分治，在個人身上結合為一的方法，來尋求中西文化的融合，仍是他所追求的目標。

四 結 論

誠如吳展良所謂嚴復畢生為一「求道之旅」，他的終極追求在於「明道救世」，而且他以「道通為一」的理念結合儒釋道之精義和西方的科學與哲學。筆者認為對嚴復而言，會通為一的「大道」就是以中西文化交融為基礎，建立富強與自由的中

嚴復畢生為一「求道之旅」，他的終極追求在於「明道救世」，而且他以「道通為一」的理念結合儒釋道之精義和西方的科學與哲學。因此，嚴復思想並不具有「兩面性」，他肯定中國倫理價值與涉及「不可思議」和「幽冥之端」的形上世界，同時也接受西方有關追求富強與民主的技術和制度安排。

國。此一交融一方面在歷史之中已顯現端倪，但同時也需要有批判能力的知識份子駁斥不當理論，建立新的典範，作為行為方針。嚴復的翻譯工作、對於具有中國特色之自由主義理論的鑄造、對於教育問題的思考等，都環繞着此一關懷。

因此，嚴復思想並不具有「兩面性」，他肯定中國倫理價值與涉及「不可思議」和「幽冥之端」的形上世界，同時也接受西方有關追求富強與民主的技術和制度安排。對他而言，這幾方面可以互補、融合，也都是建立一個理想的自由國度所不可或缺的。筆者強調嚴復環繞着積極自由來建立民主社會的想法，是他能夠將中與西、內與外，以及倫理、宗教與科學結合起來的關鍵。這又與他認為以特殊的「分而治之」的教育方式，使中西學問在個人身上結合為一，達到「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的理想，密不可分。

誠如筆者在《自由的所以然》一書所述：嚴復結合中西的自由理念其背後的思想預設是兩個植根於傳統的樂觀主義：樂觀主義的認識論，以及對人性與政治可行性的樂觀。此一理念使他的自由主義與彌爾 (John S. Mill) 所代表的西方自由傳統有所不同，後者是基於悲觀主義的認識論與對人性與政治可行性的悲觀。從此對照來看，嚴復結合自由、富強的國度與植根於傳統價值的道德理想，無疑地帶有烏托邦思想的色彩。他不夠針對西方自由主義者特別注意到的危險：「人類在智性上的不可靠」會影響到菁英份子的啟蒙工作、人類在道德上的弱點會使菁英份子控制教育，並追求己身私利，這樣一來，強調積極自由隱含着專制的危險。

再者，嚴復所謂在一個人的身上所達成的中西融合，也不是一個很容易就可以實現的理想。以嚴復來說，他深刻地了解國人在科學與信仰之間拉扯所產生的內心苦悶，1921年8月6日，在死前的一個多月，他給兒女寫了一封信：

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總着一邊，不知世間無論何種問題，皆有兩面，公說婆說，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爭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齒到，又學問閱歷成熟，方解作平衡判斷 (Balanced Judgment)。

這似乎正是嚴復的親身體驗，在他一生之中，他的生活與思想均充滿了矛盾、緊張。他的鴉片煙癮、四度參加科舉考試與落第，他對妻兒所展現的父權心態，他在政治、學術上的徘徊、徬徨，都顯示他在中西兩面拉扯之下，為「總着一邊」所苦，在他晚年似乎也無法做出「平衡判斷」。

因此，無論在生活或思想上，嚴復都無法成功地實現終其一生的理想：結合中西價值。他個人在性格上的弱點，以及他所繼承的傳統思想模式之影響，都是失敗的原因。其實，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幾乎每一個人都經歷了類似的苦痛。直至今日，中西文化的結合仍是一個艱鉅的挑戰。雖然如此，嚴復對此議題所做的思考與努力，無疑具有啟發性意義。

黃克武 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